

走近清华书系

清华名流

名师篇 □ 王国维 □ 梁启超 □ 赵元任 □ 陈寅恪 □ 金岳霖 □ 朱自清 □ 才子篇 □ 吴宓 □ 闻一多 □ 曹禺 □ 钱钟书 □ 梁思成 □ 潘光旦 □ 栋梁篇 □ 叶企孙 □ 王淦昌 □ 华罗庚 □ 邓稼先 □ 杨振宁 □ 新潮篇 □ 清华园里的创业之梦 □ 清华园里的音乐精灵

何威 徐晨亮 编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WENYICHUBANSHE

G L I U

走近清华书系

清华名流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名流/何威,徐晨亮主编

(走进清华书系)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6

ISBN 7-5354-2347-7

I. 清…

II. ①何… ②徐…

III. 清华大学—名人—生平事迹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3134 号

策划编辑:钱文亮

责任编辑:姚 梅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1808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一：名师篇

王国维	3
梁启超	16
赵元任	29
陈寅恪	48
金岳霖	68
朱自清	77

二：才子篇

吴宓	95
闻一多	108
曹禺	127
钱钟书	142
梁思成	165
潘光旦	187

三：栋梁篇

叶企孙	205
王淦昌	219
华罗庚	238
邓稼先	255
杨振宁	275

附录：新潮篇

清华园里的创业之梦	295
清华园里的音乐精灵	307

An abstract geometric design featuring a light gray background with a thin black horizontal line and a thin black vertical line intersecting. A solid black square is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right quadrant. The text '一、名师篇' is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black square.

一、名师篇

原书空白页

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字静安，号观堂，1877年10月生于浙江海宁。7岁从潘紫贵读私塾，16岁入州学，读前四史，兼治骈散文。22岁至上海，开始习日、英、德等国文字，并攻科学。继而醉心哲学，对康德、叔本华、尼采学术皆有所得；对心理学、社会学亦颇喜爱。30岁后研究文学，于诗词、戏曲、小说的研究多有深刻见地和独到心得，尤精于唐宋诗歌和宋元词曲，留下许多价值颇丰的著述。中年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取得优异成就，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地位。后来又治蒙古史、西北边陲地理等，均有建树。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清华园一隅，那块沉默的石碑……

在清华园一隅，一块丈许高的石碑静静耸立，被浓荫遮蔽，正面刻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十个大字。该碑落成于1929年7月15日，系清华全院师生为纪念王国维先生，于他辞世二周年之际筹款建立。据当年记载：“此碑位于科学馆南土山东麓两槐树之间，碑之本身，约高七尺，挺立于四尺许

高之碑基上，色呈淡黑，颇足表出哀思之意。”

石碑由国学院另一导师陈寅恪亲撰碑文；著名建筑学大师梁思成拟式，并于建碑前亲绘彩色大样，特从关外赶来清华园勘定碑址；著名的“北大三马”之一马衡篆额；名书家林志钧书丹；名刻家李桂藻刻字，在清华素有“校园第一碑”之雅颂。而使得这块纪念碑在外界广为人知的则是石碑背面由陈寅恪先生所撰写的碑文。文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石碑建起的那一年，曾名扬宇内的清华国学院因人才凋零，时势变迁而停办。历经了清华园内诸多沧桑变化，这块石碑在文革期间被推倒拖走。如今我们见到的石碑乃是后人在原处重新树立而成。流年变迁，槐树依旧，风过处树影婆娑，令人追怀。这块本来为怀念一代国学宗师而修建的石碑，竟然承担了如此多世事沧桑，赋予了如此多一言难尽的意蕴。石碑无言，或许不过是等待有心人静心聆听它所讲述的故事。

从末代帝师到国学导师

王国维是如何进入清华，从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摇身一变

而成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这其中还有一番曲折。

1922年，王国维45岁，受清逊帝溥仪之招，入“宫”担任“南书房行走”之职，实为溥仪之师。1925年，清华筹建研究院国学门，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延请因发起新文化运动而爆得大名的胡适来制定研究制度，并希望胡博士能亲自主持国学院。胡适应邀订妥制度，但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主持，便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等四位当时国内知名宗师。当时情况如何，当年国学院学生蓝文徵（孟博）曾留下如下记载：

……于是曹（曹云祥，编者注）亲自拿聘书请王静安先生，王先生不答应，曹回来找胡（胡适，编者注）。胡说有办法。原来当时王先生在清宫教溥仪，所谓“南书房行走”。溥仪劝他，王先生仍然不愿去，因为清华为洋学堂，溥仪没法，只得下一道“圣旨”——这“圣旨”我在王先生家看到了，很工整，红字。王先生没办法，只得去了。^①

同年3月25日，王先生有一封致友人的信件，也可以作为当时他来清华情况的参考。信中说：“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尔。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于上月已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至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由是观之，王国维自己也愿意入清华以避俗务纷扰，潜心学术。

1925年王国维正式到院任导师，不久，梁启超也正式应

① 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

聘而来。随后，赵元任和陈寅恪两位先生也从海外归来。王、梁、赵、陈四教授被并称“导师”，以示其学术地位高于一般教授。是年9月14日，清华研究院正式开学。据清华《研究院章程》所述：“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关于科目，则“先开国学一科，其内容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造就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因为当时只设国学一科，故也被人们称作清华国学研究院。

不论王国维来清华究竟是主动被动，他毕竟是在清华园中度过了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并一直勤恳埋首于学术研究与教学之中，一方面留下了丰硕著述，一方面培养出不下数十位日后在古文字学、史学、考古学等方面有高深造诣的人才。而他卓绝的学术对清华学术发展的带动，他的治学方法与严谨学风，都堪称后世表率，以至于人们一提起清华国学院，马上就会想起他的名字。

60年前的“研究生教育”

如今的清华大学以理工科重镇而蜚声海内，今年更有杨振宁先生主持的“高等研究中心”，以培养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为目标。回头看60年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培养研究生的宗旨，与今日的“高等研究中心”颇为相近，而起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不仅是当时培养人才的楷模，与今天的教育研究体制，特别是研究生培养体制相比较，仍有其价值，甚至超前性。

例如国学院内研究生之学业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学业方面分为普通讲演及专题研究二项。普通讲演为必修

课程，而专题研究是于各教授所指定之学科范围内，就一己之志向与兴趣、学力之所近，选定题目。学生于报考时即须认定学科范围，录取后与教授商量题目，随时至教授处请业，题目不得随意更换，以免有旷时杂鹜之弊。这种制度对导师和学生两方面都多有裨益，难怪短短几年间国学院师生取得了如此骄人的研究成果。

王国维在两年的任教期间，先后指导学员研究的学科范围有经学（包括书、诗、礼）、小学（包括训诂、古文字学、音韵学）、上古史、中国史学等。在王国维先生之子王登明多年后的追忆文章中提到了当年教学的严谨风气和丰硕成果：

父亲在培养研究生、教诲有志的年轻学者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父亲是经史小学导师，他正是以这样的教育宗旨与方法来培养学生的。他主讲的几门课程如说文、尚书、古史新证等课研究生，学后都说受益匪浅。特别是古史新证是父亲改订殷先公先王考、续考、三代地理小记、殷周制度论等论文而成，传授了他的治学与研究方法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他还直接指导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受他专业指导及受到他的教诲而成才的，不下数十人，后来大都成为古文字学、史学、考古学等方面有高深造诣的人才。

姜亮夫就是这些“有高深造诣的人才”之一，他毕生致力于《楚辞》研究，发表有关《楚辞》的论著多达四百余万字，包括晚年体现他一生学术风格的集大成巨著《楚辞通故》。然而这一切可谓发轫于他与静安先生的一席谈：“……王先生说：‘课题要自己选定！’过了三天，我把选定的三个题目送给先生看，其中第一个是诗经韵谱，第二个是诗骚联绵字考，第三个

是广韵研究。王先生看了题目后问我：‘广韵如何研究？’我的回答先生不满意。他沉默片刻后说：‘我看搞诗骚联绵字考吧！’他接着便把自己研究这方面的‘谱’（提纲）拿出来给我看。得了先生的指点，我的方向明确了，大体框架结构有了底，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开始注意起来了。”^① 这一“注意”就是半个多世纪，从他的第一部由楚辞入手的学术著作《诗骚联绵字考》，出了一个楚辞的大家。而他对当年的记述，读之犹历历在目，可见王国维先生对他影响之深远。

在教学上，王国维先生讲课非常细腻、细致，讲的是《说文》，用的材料许多是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这样一来对汉字的研究方法细密了，而且还知道许多相关书籍。王先生做学问有一个特点：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先要把有关这问题的所有材料搜集齐全，才下第一步结论，把结论再和有关问题打通一下，看看，然后才对此字下结论。这中间有一个综合研究方法，他不仅综合一次，再经过若干次总结，方成定论。例如总结甲骨金文中的资料研究殷周两代的一切制度，就是总结殷周两代个别问题的综合。姜亮夫回忆道：“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出来教书、做科研工作越来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导对我的帮助很大。”

据其子王登明所述，王国维先生在清华两年多的时间里，家中子女对他很是敬畏，其他认识他的人也有此感。例如性格开朗活泼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在他的 50 寿宴上亦避让不肯同席，因为感到拘束。一方面，因为王国维“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以及“外表严肃冷峻”；另一方面，可能也由于他

^① 姜亮夫《忆清华国学院》，刊载于《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年版。

学界泰斗、为人师表的身分使然，令他被人所敬畏。而实际上，“他是一个慈父，从不责骂孩子，对他人则是平易近人。”姜亮夫也在回忆当年的师生同乐会（类似今之联欢会）时写道：“……静安先生在同乐会上多数时间都较沉默，话很少，但感情很深沉，对我们学生像自己的子弟一样。”他还有另一段记述，充分流露了自己对先师的诚挚情感。他回忆道：

“……就为这幅画填了一首词，自己不敢相信自已，想请静安先生看一看。晚上七时半到先生家……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时，我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只见书里面用好几色打了记号。静安先生看了看我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这事在我脑中印象很深，我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而且思想也是非常前进。晚九时多，词改好后，我告辞，先生要家人点灯笼跟他一起送我到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我过桥后他才回去，他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小桥，路便好走了。’我几乎落泪。我一生也忘不了老师对我的关怀。”他对王国维先生的敬佩与爱戴之情溢于言表，而勾勒的严师慈父形象令读者也心有戚戚焉。

一位大师的最后时光

在清华的两年，也是王先生一生中最后时光。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做学问和教学生上。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外，他极少进城。他的爱好就是读书。他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与写作。学生们三五成群、恭恭敬敬来就教于他，也常有国内外学者友人来访，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王国维先生住在清华西院16与18号，两院各有朝南正房

三间，左右各一偏房，是典型北方式建筑，红漆门窗、灰色瓦顶。当年附近便是小溪树林，向东还有片片稻田。16号西屋被用作书房，书房中南窗下放一书桌，其余三面墙壁都是书架，琳琅满目全都是线装书籍；而18号则是静安先生及家人居住之处。是以书房十分安静，1925至1927年间的许多日夜，王国维先生便在这里度过，潜心工作，写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方面的许多论文，也校批了许多书籍。

这两年时光也正是王国维精力饱满、学业成熟、著作彪炳之际。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耶律文正即元初名臣耶律楚材）转入《西北地理》和《蒙古史》，致力于四夷（四方边远之地）金石文献之考证；先后完成《西辽都城虎斡耳朵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孟鼎铭文考释》、《克鼎铭文考释》、《蜀石经残拓本跋》、《宋代之金石学》、《金界壕考》、《鞑靼考》、《蒙古考》、《黑车子室韦考》等近四十篇著述。这些著述后来大都分别收入《观堂集林》、《别集补遗》等书中。由于教学上的需要，他曾把1917年前后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殷商制度论》、《三代地理小记》等文整理成《古史新证》一书，这是他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其内容开拓了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其方法则开拓了以所谓“二重证据法”及“阙遗法”二者为主要特点的新史学方法。1926年，还综合《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圣武亲征校注》为一书，书名为《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印行。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时光的脚步终于走到1927年夏，王国维“感于世变”，于

6月2日（阴历五月初三）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据其学生柏生的回忆，在自杀前一天，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因为考试结束，行将放假而公宴诸导师，席间王国维先生还兴致很高地与他们谈论有关蒙古的杂事。当天晚上，他还与谢国桢去王家问阴阳五行的起源等问题。自杀的那天上午，王国维先生还到学校，让校工去他家取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的招生事宜，时间甚久，后又向侯借大洋两元，因侯当时没现洋，故借给他五元钞票。

现在看来，静安先生的“兴致很高”兴许是因为下了必死之决心而生超脱之感罢。自杀前夜草拟遗书一纸揣入贴身口袋，熟睡如常。翌晨盥洗饮食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币五枚（另一说则是五元钞票一张），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一代宗师就此杳如黄鹤西去，怀想当日情景，怎不令人痛心黯然，扼腕叹息！

当天先生噩耗传至清华，闻者无不大感痛哉。在吴宓日记中记载着：“先是本日（指6月3日，编者按）下午四时半检验王先生遗体之际，于内衣袋中搜得遗嘱一封（又现银四元馀）。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王先生之第三公子）收启。’”遗嘱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在清王朝已被推翻的情况下却接受废帝溥仪的征召，出任废宫“南书房行走”，但身为五品“朝官”死后却“无分文财产”遗留给自己家属。从这封如话家常的遗嘱中不难读出先生之淡泊生死名利。而鲁迅也说他“是个老实人，老实得像火腿一样”^①。

王国维之死，若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成为轰动国内外的事件。“海内学者同声恸哭，乃至欧洲日本诸学术团体，相率会祭表敬悼……”已被冯玉祥赶到天津的逊帝溥仪下诏封王国维为忠愍公；而海内外学术界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仅出版的纪念专号就有四辑。然而王国维正当盛年，其学术研究也可谓如日中天，遽尔自沉，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对于他自尽原因的分析也是众说纷纭，内中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王国维自身矛盾的性格的因素，也有分析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纠缠，至今仍无定论。而王国维也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有谥号的人。

其实回溯王国维自沉的二十多年前，他便有过寄托了。其自题诗《尘劳》：

迢迢征雁过东皋，谡谡长松卷怒涛。
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
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
投阁沉渊争一间，子云何事反离骚。

据说扬雄曾以为屈原之自沉是大可不必的，写过《反离

^① 《鲁迅全集》第3卷第4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